

19-20世纪
中国文学
研究

论衡集

解志熙
沈卫威 / 选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20 世纪 中国文学研究论集

解志熙 沈卫威 选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集

解志熙 沈卫威 选编

19—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集

解志熙 沈卫威 选编

责任编辑 郝 声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电脑照排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5.5 字数:640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44.50元

ISBN7-81041-454-2/I·140

19—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集

19—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集

目 录

从近代文学革新到五四文学革命

-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导言……………任访秋 任 光(3)
- 晚清西学输入与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任访秋(19)
- 晚清文学革新与五四文学革命……………任访秋(54)
- 《中国近代文学史》绪论……………关爱和 袁凯声(71)
- 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
- 试论曾国藩、吴汝纶的文学活动与作用……………关爱和(95)
- 清代嘉道之际的文学精神与创作主题……………关爱和(105)
- 剑气箫心龚诗魂……………关爱和(121)
- 论老残……………关爱和(134)
- 创世纪的激情奏鸣……………
- 辛亥革命时期文学思潮描述之一……………李慈健(148)
- 生命哲学的艺术诠释……………
- 王国维美学思想综论……………李慈健(163)

现当代文学思潮扫描

- 从《新青年》到《新潮》……………
-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沈卫威(177)

五四知识分子思想—行为的逆差与冲突

——以鲁迅、胡适、茅盾为例…………… 沈卫威(193)

现代作家的存在探询

——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 解志熙(214)

“颓加荡”的耽迷

——十里洋场上的艺术狂欢者…………… 解志熙(259)

《飞霞》三日刊与河南新文学运动早期的理论与批评

…………… 刘景荣(289)

30年代浪漫主义文学失落的多维考察…………… 杜运通(300)

东北的生命力与东北的悲剧

——东北流亡文学的底蕴…………… 沈卫威(314)

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描述…………… 刘思谦(336)

现当代作家作品论

《野草》的思想与艺术…………… 任访秋(345)

略论鲁迅早期的西学观…………… 赵明(370)

论“新世纪的曙光”…………… 赵明(380)

《女神》中的“泛神论”思想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

…………… 任访秋(397)

朱自清新诗评论如是说…………… 张俊山(407)

论闻一多诗论和诗创作对诗美的追求…………… 王文金(431)

虽希求光明 却惧怕血腥

——林语堂“转向”原委辨析…………… 杜运通(443)

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 赵福生(458)

现代知识女性的心理踪迹

——丁玲和张洁的小说比较…………… 赵福生(468)

林徽因：澄明的生命之灯…………… 刘思谦(483)

萧红：飘泊岁月寂寞路…………… 刘思谦(508)

论苏金伞的诗歌语言及其诗意生成机制·····	张俊山(536)
蒋子龙的“开拓者家族”·····	刘思谦(551)
王文兴简论·····	田锐生(560)

解放区文学论略

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文学运动	
——中国工农兵文学运动史提纲·····	刘增杰(573)
丁玲、王实味与延安文学新潮·····	刘增杰(586)
期待着深化的研究领域·····	刘增杰(598)
论近年来的解放区文学研究·····	刘增杰(611)
解放区诗歌略论·····	王文金(620)

现当代小说艺术片论

创造性的综合	
——论中国现代散文化抒情小说的艺术特征	
·····	解志熙(631)
小说创作中的悲剧观念·····	刘思谦(650)
“新写实小说”中的市民与“新市民”形象及其意识形态	
·····	孙先科(666)
作者的在场与退场·····	孙先科(679)

学术批评与研究方法漫谈

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研究述评·····	刘增杰(699)
“古典化”与“平常心”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断想·····	解志熙(729)
从本体到方法	
——文化批评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解志熙(746)
新时期胡适文学研究述评·····	沈卫威(763)

为建设有特色的学术研究基地而努力奋斗”地家告训平“所平其

——河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点建设概况

..... (785)

编后记

..... (808)

.....

.....

.....

.....

.....

.....

附录

附录一

附录二

.....

.....

.....

.....

.....

.....

.....

.....

.....

.....

.....

.....

.....

.....

从近代文学革新 到五四文学革命

为建成国际一流本研教育基地而努力奋斗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筹建处

(785)

陈草堂文集卷八

(788)

陈草堂文集卷四

《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导言

任访秋 任 光

中国近代是充满着激烈动荡和急速变化的历史时代。鸦片战争打破了清帝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面前,代表着落后生产力的“天朝上国”显得衰败与腐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以儒学为标志的传统文化越来越暴露它的空疏与无用。随着列强侵略的不断加剧,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部分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他们继承了中国文化中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思想解放的进步传统,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精神,在这一新的思想起点上,在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展开了对桎梏人心、抑制民族生机的儒学的批判,兴起了以革新除弊、图强御侮为内容的社会思潮。

这一社会思潮的开创者,应首推龚自珍和魏源。

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夕,就已预感到“衰世”的危机。他不满意封建士子们或沉湎于汉学、或桎梏于宋学的社会风气,主张经世致用之学。他向顽固、愚昧的专制统治者发出不进行改革、就必然灭亡的警告。但因他对西方社会还了解甚少,所以只能向古代改革家那里寻找思想武器,正是“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己亥杂诗》之四四)。而魏源则经历了鸦片战争后的社会现实,并对西方社会有了较多的了解,于是进一步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们虽然分别对程、朱理学的“性善论”和“知先行后说”以及今不如昔的复古主义进行了批判,然而他们还不可能冲决儒家

思想的网罗。但在万马齐喑的道、咸之际，他们的议论却如一闪的彗星划破了浓郁的阴霾，在思想界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巨大震动，惊醒了许多迷惘彷徨的知识分子，开始考虑救亡图存的改革方略。

到了同、光时期的康、梁师弟等人，对西方的学习已不再是停留在物质文明上面，而是把着重点转移到了精神文化、政治制度这些更深的层次上，并把改良主义的理论付诸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先天软弱，对封建皇帝的依附，决定了他们对儒学批判的妥协性，表现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借孔子的亡灵给维新运动罩上一层神圣光圈。梁启超深受乃师的影响，认为：“孔门之学，后衍为孟子、荀卿两派。荀传小康，孟传大同。”“二千年间，宗派屡变，皆盘旋荀学肘下。孟学绝，而孔学亦衰。”（《清代学术概论》）他和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把西方的“民权”学说与孟子的“民本”思想相傅会，鼓吹君主立宪。他们通过对荀子的批判，来攻击为封建专制服务的汉、宋儒学。谭嗣同在《仁学》中说：

故常以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

夏曾佑则勇于超越一般维新派的认识水平，称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是“本孔子专制之法，行荀子性恶之旨”（《中国古代史》第一篇第一章第六节）。维新派的排荀，比经世派的反程、朱的思想内涵深广得多了，从而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解放。

改良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立场出发，展开了对儒学思想的批判。革命派的理论家章太炎，继承发扬了汉代王充“追难孔子”和“伐孔子之说”的战斗精神，首先举起了批孔的旗帜。他痛斥宣扬“中庸之道”的孔子，实则是“有甚于‘乡愿’的‘国愿’，是一国中最大的伪君子，并指出‘儒术之害，则在混淆人之思想’（《诸子学略说》）。他还自觉地把批孔与反帝、反清结合起来。他揭露西方列强利用儒学进行侵略的

实质，他们“籀读吾经纬以号于众曰：‘吾有仲尼之遗计籍焉！’若是，则西教愈杀也，而中国自是终于左衽矣！”（《馘书·忧教》）至于清王朝统治者“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在于“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刘师培继章太炎而起，撰文批判孔孟之道和纲常名教。在章、刘的带动下，革命派掀起了一阵批判儒学的浪潮。总之，近代对孔学的批判，从经世派、维新派到革命派，恰如剥笋一样，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这一批判，在近代史上具体表现为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这一批判，推动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入发展，并为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一批判，也同时构成了近代文学思想发展的主流，而作为近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散文，也很自然地带着这种鲜明的时代印记。如果循着龚自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散文发展脉络，就会从中清楚地看出中国近代史前进的轨迹。

中国近代散文，是由古代散文衍变而来的，但因为西学的东渐，使之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外，又融合了西方文化的某些素质。但这种融合并不是盲目的、无条件地进行着的，它决定于每一个作家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根据自己的需要，像对传统文化的选择那样，对西方文化也有一个取舍改造的过程。例如，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经世派作家，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的是公羊学的通经致用精神，是李贽、戴震等人反对程、朱的民主思想，从西方文化中找到的是中国变革图强的方向。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洋务派作家，所恪守的是儒学，尊奉的是程、朱，他们看中了西方的坚船利炮，是因为可以用来镇压人民维护清廷的腐败统治。这种在中西文化上不同的价值取向，是形成近代散文发展史上两大流派的重要因素。经世派作家勇于冲破传统古文的樊篱，敢于向扼杀个性、窒息创新精神的儒家“诗教”挑战，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呼唤着时代的风雷。继经世派而起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散文作家，对这一传统，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都作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而洋务派作家，则是标举桐城派古文，追步韩、欧，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在写作技法上也有所增益，但终因囿于传统文化的窠臼，很少出现有价值的作品。至于维新时期，严复和林纾用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和小说，是由于深邃的思想和全新的意境，才使古文在文坛上得以象成绮的余霞为人瞩目。

近代散文的第一位作家是龚自珍。他生于“举国醉梦于承平”之中的嘉、道之际，但却能站在时代的峰巅，以哲人的睿智洞察危机四伏的历史，并以不拘一格的散文体式表达对于现实的深邃思考。他不仅在政治上倡言变革，而且在文学观上也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开拓精神。他继承发展了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在《病梅馆记》中愤怒地谴责了封建专制摧残人性的罪恶，表达了打破一切桎梏、要求自由健全发展的审美理想。文章中蕴含着要求冲决罗网、解放个性的深厚的社会思想内容。出于这种认识，龚自珍不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世风所囿，或以谈经论史、或以寓言小品、或以写人记事等多种散文形式寄寓忧愤，针贬时弊，倡言变革。他的散文没有桐城古文的迂拘，又不像选派文章的偶俚，更不像考据家散文的朴拙，而是一种汪洋恣肆、纵横驰骤、豪放跌宕、淑诡谲怪的文章。龚自珍的散文，为近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

龚自珍的好友魏源，在文论上基本未能超出“文以载道”的正统观点，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他的政论文，议古今成败利病、学术流别，内容翔实，语意明白畅达。他的山水小品清彻冷隽，豁人耳目，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经世派中影响较大的散文作家还有林则徐、包世臣等人。

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不信义法之说”（《复庄卫生书》），提出解放散文的主张。他的《校邠庐抗议》开创了政论散文的新体式。他和王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等人形成了后期经世

派作家群。这些作家比早期经世派作家更注重向西方学习,并初步地以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来观察和试图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方略。他们中的许多人到过港、澳及欧、美,对资本主义文化感受较深。其中的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陈炽等人都倾向于西方的“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政体,但在“体、用”问题上仍未与洋务派划清界限。他们为了传播西学,往往把西学的源头附会为中国古代的“圣学”,想以这种调和来消除保守势力对西学的排斥。

后期经世派的作家群中,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容闳的《西学东渐记》、薛福成的《筹洋刍议》、马建忠的《适可斋纪言纪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陈炽的《庸书》、王韬的报刊政论文等研讨时务的著作或文章,不为古文、骈文、时文所限,条分缕析,明白畅达,虽然过于质朴,略少文采,但由于新的思想、新的意境,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因而流行极广,影响很大。

龚自珍在《尊隐》篇中写道:“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暗示了革命风暴即将来临。在他去世十年之后,即1851年爆发了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信奉基督教义,创立拜上帝会,并打毁孔子牌位,提出反映农民平等思想的口号,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就文学的变革问题,颁布了《改定诗韵诏》,命令左史右史,把《诗韵》(指《诗经》)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另外,洪仁玕等人发布的《戒浮文巧言喻》,也明确指出“文以纪实”、“言贵从心”,文风要“朴实明晓”,“实叙其事”,反对“浮文巧言”。对待古代典籍采取“弃伪存真,去浮存实”的态度。这和洪秀全的主张是一致的。但在散文的写作上,太平天国却未能留下有价值的篇章。

当经世派作家蓬勃兴起的时候,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曾国藩,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重张桐城派姚鼐的帜志,为古文的“中兴”竭尽了全力。

桐城派古文在清代文坛上长期居于正宗的地位。方苞、刘大櫟开其端，姚鼐集其大成。姚鼐在提出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理论（《述庵文集序》）中，义理指的是程、朱理学，在三者之中占主导地位。正如曾国藩所说的：“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欧阳生文集序》）姚鼐之后，和龚、魏同时期的桐城派作家，影响较大的有所谓的姚门四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管同和方东树是桐城派道统、文统的忠实捍卫者。方东树著《汉学商兑》，说他平生读书，“惟于朱子言为独契，觉其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抵触者辄恚恨”。甚至借皇帝的“圣喻”，指责有违于朱熹的，都是“乱经”、“叛道”。他在《答叶溥求论古文书》中，又极力强调桐城的文统所在，他说姚鼐《古文辞类纂》所选古文辞，“八家后，于明录归熙甫，于国朝录望溪、海峰，以为古文传统在是也”。正因为这样，方东树和管同的古文，凡涉及社会政治方面的议论，多陈腐不可取。

梅曾亮受管同影响，由喜为骈文而专攻古文，在文坛上，继姚鼐后颇负盛名，他对古文的看法，基本未离桐城派的轨辙。他虽然主张文章应因时而变，但只限于形式，而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则是始终如一（《答朱丹木书》）。梅曾亮的散文力求雅洁，文笔清淡简朴，除少量的写景记事文章外，多为无价值的碑传书序。

姚莹是姚鼐的侄孙，道光初年，他在京师与龚、魏、张际亮、汤鹏等人交好，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致力于经世之学。他购求外国书籍，关心国内外形势，在任台湾道时，曾积极抗击英国侵略军，所以在他的思想中颇有些经世派作家的色彩。他在散文的写作上，并不株守桐城家法。他强调文章与作者的人格、学识、经历的关系，反对桐城派作家“不求数公（指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之所以为人，而惟求数公所以为文”（《康輶纪行》）的形式主义的追求倾向。方宗诚说他：“虽亲炙惜抱，而亦能自出机杼，洞达时务，长于经济。植之先生称其义理多创获，其议论多豪宕，其辩证多浩博，而